



城市史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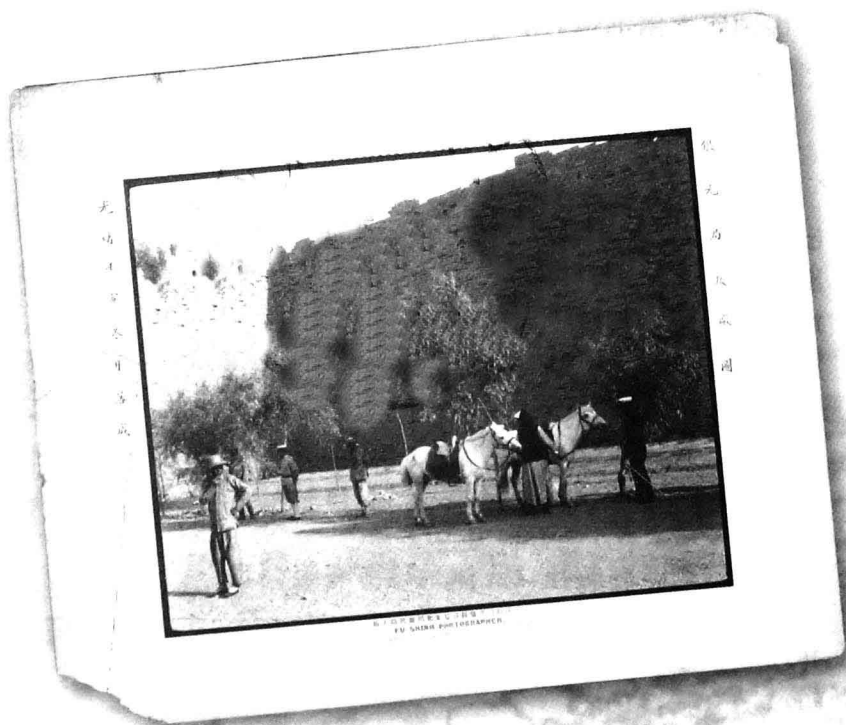
天津社会科学院 主办



第 20 期

城市史研究

天津社会科学院 主办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城市史研究. 第 29 辑/天津社会科学院主办.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7-80688-971-8

I. ①城… II. ①天… ②天… III. ①城市史-文集

IV. ①C912. 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52667 号

出版发行: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人: 项新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责任编辑: 高潮

邮编: 300191

电话/传真: (022) 23366354 (总编室)

(022) 23075303 (发行科)

网址: www.tass-tj.org.cn

印刷: 高教社(天津)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5

字数: 280 千字

版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城市史研究》编委会

顾 问 张健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万新平 王立国 李长莉 何一民
 张利民 周俊旗 靳润成 熊月之

本期主编 张利民
副 主 编 任云兰 任吉东 王 敏 范 瑛
编 辑 张 博 万鲁建 许哲娜 熊亚平
 王 静 成淑君 丁 芮 刘凤华

目 录

社会生活

- 李长莉 晚清“洋货”消费形象及符号意义的演变…………… (1)
- 许哲娜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报纸广告图像中的现代都市
社会性别图景
——以天津《大公报》、《益世报》为中心的考察…………… (29)
- 成淑君 焦虑与风化
——近代两性道德规范的调适和重建…………… (55)
- 柳 敏 近代青岛的社会教育事业与移民的城市化…………… (67)
- 付燕鸿 近代城市贫民娱乐生活研究
——以近代天津为中心的考察…………… (84)

城市个案

- 何一民 清代西藏城市的发展演变…………… (99)
- 戴建兵 侯 林 近代天津与内河水运(1860~1937)…………… (136)
- 钟 翀 《天津城厢形势全图》与近代早期的天津地图…………… (157)
- 宾长初 清代西江流域城镇商业的量化分析
——以平乐镇为个案的考察…………… (168)

研究述评

- 刘 宇 近三十年来东北城市史研究评述…………… (185)

丁 芮 重新思考中国城市史研究
——“比较视野下的中国都市研究”高级研修班综述
..... (200)

王 静 继承与拓展: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新起点
——“城市发展与中华民族复兴暨首届中国城市史年会”
述评..... (207)

海外研究

[英]罗伯特·毕可思著 许哲娜、喻满意译 孵化器之城:上海与
帝国危机..... (220)

[韩]朴尚洙著 任吉东译 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之回顾与瞻望
..... (250)

[美]何凯思著 任云兰、伍沙译 从殖民港口到社会主义大都市:
帝国遗产和“新大连”的崛起..... (271)

[英]利夫·杰拉姆著 王静译 《沉默的 20 世纪欧洲街头史》导言
..... (293)

[日]山本进著 万鲁建译 清代直隶的地域经济和李鸿章的直隶
统治..... (308)

晚清“洋货”消费形象及符号意义的演变

李长莉

内容提要:晚清自开口通商到清末数十年间,洋货经过初销、流行和普及三个阶段,在人们心目中的消费品形象也经过了从“奢侈品”、“时尚品”到“实用品”的演变,逐步普及化、实用化、大众化。伴随着洋货流行的不同阶段,当时人对于洋货的符号意义,以及对于国计民生的意义及后果的认识也有变化。起初从传统“经世”角度,视一切洋货为“奇技淫巧”而主张完全禁绝,到区分“有用之物”与“无用之物”,直至从市场角度,认为洋货流行是国家财富外流的“漏卮”,同时也是增值财富的“利源”,到呼吁发展民族工商业,与外国列强争夺机制品市场,以夺回“利权”。这一演变过程,反映了当时人对于“洋货流行”这一市场现象的认识,从传统“经世论”向近代“市场论”转变,成为发展近代工商业这一社会改革思潮的重要来源和社会基础。

关键词:晚清 洋货 消费 符号意义 近代观念

Abstract: Since opening trade in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Qing dynasty for decades, foreign goods went through

three stages (first, popular and popularization), and it had undergone from “luxury” and “fashion” to the evolution of the “real thing”, were gradually universal and welcoming practical. With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foreign goods’ popula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eople had changed for symbols of foreign goods, the meaning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At first from a new perspective of pragmatism, people treated all foreign goods as “diabolic tricks and wicked craft” and advocated a complete banning, to distinguished between “useful thing” and “useless thing”, until from the market angle, thought that it was national wealth outflow “LouZhi”, at the same time it was also a proliferation of wealth “source”. Therefore, people call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industry and commerce, competed with foreign powers for the mechanism of product market in order to regain “economic rights”.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and the states reflected the understanding for popular “foreign goods” of the market phenomenon, the transition from “Jingshi lun” to “market thesis”, and became a social reform trend of development of modern industry and commerce the important source and social foundation.

Key words: late Qing dynasty; foreign goods; consumption; symbol meaning; modern ideas

鸦片战争后清廷被迫开口通商,西方各国开始竞相向中国倾销商品,抢占中国市场,掠夺中国财富与资源。于是,五光十色的“洋货”继鸦片之后,开始通过通商口岸批量输入,且数量与种类逐年增长,随之一些日用洋货开始逐渐进入城乡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直至清末的几

十年间,洋货由城市到乡村日益普及,对广大城乡民众的消费与生活影响日大,并由此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及社会观念,成为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社会生活因素。

那么,作为生活消费品的“洋货”,是怎样影响人们的消费观念与社会观念的呢?这需从人们怎样看待“洋货”、“洋货”在人们生活中具何种地位,以及“洋货”在人们的消费生活中具有什么形象进行考察。同时,“洋货”作为西方机器生产制品和国际贸易商品,是近代工商业生产方式及资本主义文明的承载物,其进入中国社会,在当时人心目中具有怎样的符号意义?对中国社会及国计民生具有怎样的影响与后果?当时人是如何认识的?这是考察洋货对人们社会观念影响的一些关键问题。关于洋货的输入、流行及社会影响,以往曾有一些相关研究^①,但对于上述问题还缺乏专门研究,本文即作一初步探讨。

一、“洋货”流行及其“形象”变化

“洋货”是明清时期出现的一个名词,一般指由海上外国商船运来的海外物品,多为欧洲商品。明末清初以后,欧洲商船开始经常来航,运进中国的“洋货”也渐增多。起初主要是钟表、八音盒、晴雨表、玻璃器皿、呢羽、骨角皮革等工艺制品,因其制作奇巧,为中国所无,一般称为“西洋奇器”或“西洋奇货”。又因数量有限,价格昂贵,多为供人观赏而少实用性的“玩好之物”,即所谓“玩货”,故被视为域外方物、珍稀奢侈品,或为豪商富宦购买珍藏,或贡献于皇帝供其赏玩与赏赐,一般百姓难得见到,更无力购买。

鸦片战争后开口通商,西方各国商船开始自由往来各口,各类洋货

^① 对“洋货流行”问题本人在以前的论著中曾对若干侧面作过一些讨论,参看拙著《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的有关章节,以及发表论文《洋布衣在晚清的流行及社会文化意义》,《河北学刊》2005年第2期等。

也随之源源不断地、成批量地输入中国,并运往各地市场销售,“洋货”遂逐渐成为人们在街头商铺里也可以看到的日常货品。在1842年开口通商直至清朝灭亡的70年间,洋货从开始批量输入销售,到日渐推广行销而流行开来,直至普及到城乡民众的日常生活,经过了一个持续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在不同时期洋货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有所不同,随之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也有变化。

(一)洋货初销时期(19世纪40~60年代):洋货形象——奢侈品与高档品

鸦片战争前,仅有广州一口允许海外商船来往,且只能通过“公行”进行有限贸易。鸦片战争后,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口开放通商,且允许外国商人上岸居住、自由贸易,中西通商的大门首先从东南沿海豁然洞开,英、法为首的欧美各国商人,遂带着开拓东方市场的梦想与热望纷纷涌入中国,开始大批输入商品。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东北沿海和长江流域又增开多处通商口岸,中外贸易渠道大幅拓宽,形成了覆盖中国东部和中部广大地区的洋货输入主渠道。在此二三十年间,进出口贸易逐年增长,洋货输入的数量和种类持续增加。据统计,仅从主要对华进口国英国每年输入商品量来看,1845年时输入总值为240万英镑,1860年增至436万英镑,到1869年增至800万英镑,二十多年间增加三倍多。^①

但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在小农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一般民众的衣食住行生活日用物品,基本上是自产自用、自给自足,只有少量不能自产自制的物品,通过本地集市交换补充也基本可以满足,因而生活日用品对外来物品需求甚少。又由于人们普遍生活不富裕,对超出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十分有限,所以外来洋货起初进入中国市场并不顺利,销售只有小幅增长。通商初期进口的洋货,原有的钟表、玻璃制品、毛织品等非实用的“玩货”,仍然只是少数人问津的“奢侈

^①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37页。

品”，输入量增加不多。新增及输入量增长较快的是具有一定实用性的生活日用品，开始批量输入。其中鸦片由于具独占性而没有旧货的市场竞争，吸食人数也不断增多，因而通商初期一直是进口洋货的大宗，约占一半左右。后来随着输入日用杂货种类增多，特别是棉织品及其它一些低端日用杂货批量输入，市场逐渐扩大，销量日增。日用洋杂货中特别是一些适用而又价格不高的低端日用品，销售量持续增大，进口量也有所增加。如价廉物美的洋布手帕，1859年由上海口岸进口约9万打，1869年时增为10万打。^①另如价低实用的洋针，上海在1867年时进口21百万枚，两年后增至89百万枚。^②可见这些价廉而适用的日用小洋杂货受到人们欢迎而畅销日广。

洋货作为一种新商品逐渐进入销售市场。首先在通商城市里，出现了专门售卖洋货的洋货行和洋杂货店，在一些旧式商铺里的货架上，也开始有日用“洋货”与旧式“土货”并列摆放售卖。如上海开埠后，租界地区已随处可见中外商行店铺里摆放着各种奇巧洋货。1850年代一位上海居民记述道：“闾閻间所陈西洋奇器，……如观星镜、显微镜、寒暑针、风雨针、电气秘机、火轮机器、自鸣虫、鸟能行，天地球之类，下至灯瓶盂碟一切玩具，制甚精巧，亦他地所无”。^③这些还属于观赏性的“玩好之物”等奢侈品，而在一些日用杂货零售店铺里，也可以看到一些实用性的日用洋杂货。如1862年《上海新报》上刊登一家商行售卖“外国杂货”的广告，开列有“新到什锦饼干、酸果、洋醋、吕宋烟、罢（白）兰地、小面镜仔、东洋竹篮仔等”。^④

但是，在开埠初期的一二十年间，像洋布、洋皂、玻璃制品等日用洋货，虽多制作精致，外观漂亮，有的也比土货更好用，但由于售价比土货贵，普通人家还很少购用，人们只是把它们看作有钱人为好奇炫新才会

① 上海百货公司等编著：《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② 《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第5页。

③ 王韬：《瀛壖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2页。

④ 《上海新报》1862年6月26日。

买的奢侈品、高档品。所以,这一时期进口的洋货大多销售不旺。例如作为洋货中比较普通的洋布,在上海直至开埠七八年后,才出现了第一家专门卖洋布的清洋布店。^①再如洋袜最初也不受人们欢迎,由于洋袜袜口紧,穿着不如土布袜方便,价格又比土布袜高,因而只是少数城市富户子弟穿着以学时髦。^②到了50年代末,特别是60年代以后,洋货的销售才开始大幅增长。

(二)洋货流行时期(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洋货形象——时尚品

进入70年代以后,一方面洋货市场不断开拓,一方面洋货制造和运输成本降低,使零售价普遍下降,遂使洋货销售进入了畅销期,洋货的输入量呈激增态势。据一项统计,1870年进口洋货总值6400万海关两,比六年前增长了近38%,1880年增至7900万海关两,1890年更增至12700万海关两,比1870年增加一倍。货物品种的比例也有变化,初期一直占进口货物大宗的鸦片比例有所下降,棉织品及其他杂货的比例上升。^③

这一时期洋货畅销表现在销售量增大且种类增多。一些适用而又廉价的日用洋货,因销售量增大而进口量大幅增加。如洋布手帕1869年进口量为10万打,1879年猛增至35万打,十年内增加了2.5倍,到1889年又增至40万打。^④另如价低实用的洋针,1867年上海进口21百万枚,两年后激增为89百万枚,又过了五年,到1874年更增至133百万枚,短短七年间,就增加了约6倍。^⑤由此可见这些日用小洋货已日见畅销。与此相伴随的是经销洋货的商家店铺越来越多。如70年代仅上海一地专门经营进口货的洋广杂货店有不下百十家。^⑥人们在

① 葛元熙:《沪游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79页。

② 《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第19~20页。

③ 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7~123页。

④ 《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第5页。

⑤ 《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第5页。

⑥ 葛元熙:《沪游杂记》,第28页。

市场上可以见到的日用洋杂货花色品种也日益丰富。如 1872 年 4 月 30 日《申报》创刊号上,刊登上海一家“衡隆洋货号”的广告上可以看到,这个洋货号所售的有镜子、洋纺织品等日用洋货,洋纺织品的品种即有哈喇大呢、哆啰彩呢、羽毛、哔叽、花素羽纱、羽茧、羽绉、羽绫、新式五彩花布、各样牌子原布、粗细斜纹、洋标布等十多种。长期在上海经商的郑观应于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写的一篇文章中,就历数当时常见的各色日用洋杂货,一口气列举了日用、衣物、食物、器物、玩好等洋杂货 57 种。其中食物类如洋酒、洋糖、洋盐、洋药、洋烟、洋肉脯、洋饼干、咖啡等;用物类如洋布、洋绸、洋呢、洋被、洋毯、洋手巾、洋花边、洋火、洋油、洋灯、洋针、洋线、洋纽扣、洋皂、洋钉、洋伞、洋牙刷、洋牙粉、洋颜料、洋纸、洋笔、洋墨水等;玩好类如洋钟表、寒暑表、电气灯、自来水、照相玻璃、眼镜片、五金制品等,此外“零星莫可指名者亦夥”。这些“洋货”不仅制作精致,美观适用,而且价格随着技术工艺的改进和运输的便利而不断降低,堪称物美价廉,因而广受人们欢迎,争相购用,销量日广。如郑观应所说:这些洋货“各种类皆畅行各口,销入内地,人置家备,弃旧翻新”。^① 洋货开始在城乡居民中流行开来。

洋货的流行从地域上来说,是沿着商贸运输销售路线,由沿海沿江通商城市向内地、由城市向乡村而层层向外扩展。首先是通商城市居民,因地缘的便利及消费能力较高而购用洋货的人日多,呈现洋货日益流行之势。上海是通商首埠,领洋货流行风气之先自不待言,后起的通商城市也随之而起,成为洋货流行的地域中心。如武汉于 1860 年开埠后,杂货行号也广泛经销日用五金、钟表眼镜、火柴肥皂、假珠宝、化妆品、玩具、针织袜等日用洋货。^② 通商城市的周围地区,因商贾贩运之便和受城市风气的影响而随之出现洋货流行之风。有记上海周边地区洋货流行情况,如松江府:“上海番舶所聚,洋货充斥,民易炫惑。洋货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战上》,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587 页。

^② 章开沅等主编:《湖北通史(晚清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73 页。

率始贵而后贱，市商易于财利，喜为贩运，大而服食器用，小而戏耍玩物，渐推渐广，莫之能遏。”^①80年代中期，有人记邻近天津的玉田，人们日常所需洋货“至不可胜数”，甚至说一般居民“饮食日用曰洋货者，殆不啻十之五矣。”^②到了七八十年代以后，日用洋货不仅成了城市居民流行的日常用品，而且也波及内地村镇。在深居腹地的四川，就有从武汉沿长江运来的洋货销往各地。70年代后期，一个外来游客在邻近四川的偏僻地区云南昭通，就在商店里看到陈列着不少洋货，有洋布、钟表、纽扣、玻璃、洋铁器等。^③有些物美价廉、经济适用的日用洋货，这一时期已经在城乡广泛流行，渐有取代土货而主导市场之势。如进口机织洋布，由于比土布细密平滑、色彩鲜艳，且售价渐低甚至低于土布，因而广受人们欢迎，在各地城乡市场日见畅销。1889年有大臣上奏说到洋布大销取代土布之势：“棉布为中国自有之利，本无须取给于外洋，乃洋人以机器织成，幅宽质细，价廉而适于用，人皆便之，反弃土布而不用。”^④同时期郑观应也说到洋布流行的情形：“自洋纱、洋布进口，华人贪其价廉质美，相率购用，……迄今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衣大（土）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八九。”^⑤

但这一时期，多数洋货还被视为时尚物品和中高档用品，在城里人和乡镇中上流社会流行，在内地、特别是乡村下层社会，由于购买力有限，一般生活日用品还大多沿用成本极低的土货旧物。在一些内地城乡地区，购用洋货仍被人们视为是赶时髦、追时尚的过度消费。

① 博润等修，姚光发等撰：《松江府续志》卷五，“疆域志·风俗”，黄苇、夏林根编：《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184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2页。

②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3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06页。

③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3册，第1106～1107页。

④ 《光绪十五年奕劻奏》，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3册，第1359页。

⑤ 郑观应：《盛世危言·纺织》，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715页。

(三)洋货普及时期(19世纪90年代中期~1911年):洋货形象——“物美价廉”生活实用品

中日甲午战争后直至清末,又增开了数十处通商口岸,全国通商口岸数量达到百余个,遍布南北各地,洋货通过这些口岸源源输入,数量持续增长,销售地域也更广。同时,这一时期中国出现办实业热潮,本土商人设厂仿造一些低端日用机制品——后称“国货”,如火柴、洋布、纸烟等。这些本土“仿造洋货”成本比输入品低,因而价格更低廉,虽然往往质量比输入品差,但功能仍优于旧式手工制土货,因而受到消费能力较低的下层人欢迎。这一时期民间仍习称“洋火”(火柴)、“洋布”等一些日用机制品,实则其中已有我国企业制造的国产品,这些名称已经成为某种物品的类称,一般老百姓作为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生活日用品,大多只认物品而并不辨其产自何处。但多数生活日用品,进口洋货仍然以其物美价廉的优势而占据主要市场。洋货量多价廉销售更为广泛,流行更加扩大,到90年代以后日渐普及。这一时期,一些生活实用洋货,特别是一些物美价廉又经济实用的低端日用洋杂货,日渐普及到了广大城乡民众日常生活中,有的基本取代了原有土货而成为人们的日用必需品。

这一时期日用洋货的普及,首先体现在无论城乡上下各个阶层民众,普遍购用洋货作为生活日用品。如1904年某报有文论道:“自通商以来,洋货之灌入中国者,几不可以数计,大约外自各城巨镇,内至穷乡僻壤,上自豪商巨贾,下自穷户小民,惟一日三餐或犹守其旧俗,不尽喜食西人之物,其余则身之所衣,手之所用,殆无一不于洋货是赖。……窃谓近人喜用洋货之习业已滔滔皆是,不可复挽,而洋货亦实有可以畅销之理,更非人力所能禁遏。”^①

洋货普及的另一表现就是,进入人们生活的洋货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丰富多样,几乎遍及人们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各个方面。据在北京的日本人1905~1906年调查,北京市场上的日用杂货只有少部分

^① 《论上海速成女工师范传习所》,《济南报》1905年2月1日。

土产品,多数已经是来自上海、广东、天津等通商口岸的进口机制品,即俗称的“洋货”。其种类繁多,常见的生活日用品如火柴、洋灯、钟表、棉布、衣服、帽子、毛巾、手帕、纽扣、洋针、颜料、纸烟、蜡烛、香皂、香水、玻璃镜、洋伞、纸类、文具、机械类、皮包等。^①除了这些生活日用品之外,还有其他涉及人们生活各个方面的洋货物品也日渐流行。1911年一篇报纸文章中列举当时人们普遍日常购用的洋货,除洋面、洋布、煤油等日用必需品之外,还有:生活享受品,“若洋酒、纸烟等,虽属嗜好之品,然近年销行之趋势,亦有日盛一日之观”;教育用品如石板、石笔、铅笔、钢笔等;化妆用品如香粉、香水、牙粉、牙刷之类,“所销甚多”;还有一些原来主要是土制品的市场,也开始出现洋货,如洋瓷、洋伞、洋纸等。“其余大宗零星之洋货,受我国人欢迎者,尚属不胜枚举,更仆难终也。”^②

1911年《东方杂志》载文述及一些低端生活日用洋货在社会各阶层普及的情形:

洋布:“吾国人无论男女用此制夏衣者,几有普及上中下三流社会之势。盖吾国原有之丝纱及葛布,非质粗,即价贵,反不若洋纱布之价廉物美,故大受国人之欢迎。”

煤油灯:“自煤油盛行以来,而洋灯之用,亦遂普及于各级社会之间矣。试观店肆人家,其不用洋灯者,殆十无其一,流行之盛,于此可见。”

肥皂:“我国往昔洗濯器物,用以荡涤污浊者,惟天然碱而已。自洋皂盛行以来,坚净洁白,大受国人之欢迎。……此物销路亦颇繁盛,我国现在虽有仿制者,然多属普通之品,且出货不多,行销亦未大盛,亟宜推广经营。至精良肥皂即所谓香皂者,现亦遍用于各流社会之间。”^③

城镇居民由于缺乏自产自制条件,生活日用品大多需购自市场,因

① [日]服部宇之吉等撰,张宗平、吕永和译:《清末北京志资料》(1907年初版),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版,第353~356页。

②③ 《今日亟宜振兴应用工业以裕生计论》,《东方杂志》1911年第8卷第7号,第2~9页。

而购用洋货最为普遍。特别是通商城市居民,由于是洋货集散地,销售点多,衣食起居生活日用更是普遍购用洋货,有的品种已经成为日常生活必需品。时人有记云:“家居都会商埠者,则起居、衣服、饮食及一切日用品、奢侈品,更无一而非洋货,其心目中,固以为非舶来之品,无一适用也。”^①

日用洋货的普及由城市也日渐扩展到乡村。有记上海附近的嘉定县自光绪中叶以后洋货逐渐普及的情形道:“取火之物,向用火石,……光绪乙未(1895年)、丙申(1896年)之际,始改用火柴,俗称‘自来火’,为欧洲之输入品。……洗衣去垢,曩日皆用本地所产之皂荚,自欧美肥皂行销中国后,遂无用皂荚者。……窗格旧用蛎壳,亦有以纸糊者,光绪中叶以后,则多用玻璃矣。”^②一些日常生活所需的低档细小、花费不多的生活日用品,已经销往城乡各地,广为普及,即使是穷乡僻壤也可见到。清末时人记云:“晚近以来,……洋货进口日增月盛,人之起居衣食,无论富贵贫贱,几无一人不用洋货。”文中列举火柴、洋布、食糖三种外洋输入的日常用品,谓“虽穷乡僻壤,求之于市,必有所供。”^③另有人记道:“洋货盛行于中国,凡乡僻之地吾人苟能涉足者,如香烟、洋灯、珠绒、面巾等类皆能具之。”^④清末时洋布已成为城镇居民日常穿用的主流布料,即使是一些边远地区,城镇居民也流行穿洋布。如广西贵县:“清光绪中叶以前,衣料多用土货。……光绪季年,衣料寝尚洋货,即线缕巾带之微,亦多仰给外人。”^⑤

清末时期虽然洋货在全国各地城乡日益普及,但城乡之间、大城市与边远乡村之间还有差别。一些比较偏远、交通不便的内地乡村,购用

① 《专用洋货者非国人》,徐珂:《清稗类钞》(第四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90页。

② 陈传德修,黄世祚、王焘曾等纂:《嘉定县续志》卷五,“风土志·风俗”。黄苇、夏林根编:《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1840~1949),第343~344页。

③ 《专用洋货者非国人》,徐珂:《清稗类钞》第四册,第1690页。

④ 汪康年:《汪穉卿笔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212页。

⑤ 欧阳羲修,龚政,梁崇鼎等纂:广西《贵县志》(1935年本),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下),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0页。